

戴震文献整理的观点与方法

李红英

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一书中总结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巨大成就，涉及经学、小学、音韵学、古籍校注、辨伪辑佚、史学、方志学、地理学、谱牒学、历算学、乐曲学等。统而言之，可以说这是清代学者在文献学方面取得的成绩。文献，指的是典籍与先贤。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；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徵之矣。”朱熹注：“文，典籍也；献，贤也。”这种对文献研习、考订的学问，可称为文献学。梁启超在书中说，清代学者一反明人治学空疏之风，转而整理旧学，专注于从书本上探求圣人大义、孔孟之道，是想达到他们所认为“实事求是”的目的，也是有鉴于明末的空言性命之学而矫之。也许，清人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于对几部典籍的整理工作，似乎有些矫枉过正；梁启超认为清代学者对旧学的这种整理工作，今天看来至少有一部分是白费，因为他们若是把精力投入到别的方面，就会有更大的成就。但历史不能假设，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古人，求全责备，正如梁启超书中所言，清代学者的治学精神与方法，确有一部分可以做今人学习的典范，可为后人如何整理古籍提供很大借鉴。

以整理旧学为主要内容的清代学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，通过训释文字音韵，以经典文本的考证为其治学核心，主张故训明则古经明，即通常所言的乾嘉考证学。清初学者如顾炎武、王夫之、毛奇龄、胡渭、阎若璩等，不满于明人不言训诂、空谈臆说宋人性理、违离本经，认为汉儒去古未远，多得儒家典籍精髓大义，因而倡言汉儒文字故训，提出“读九经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”的整理古籍经典的观点与方法。乾隆初年，惠栋《九经古义述首》再次提出识字审音之重要性：“经之义存乎训诂，识字审音，乃知其意”，认为应该笃守汉儒古训、经师疏注，崇汉抑宋之风兴起。之后，戴震更进一步强调文字音韵是读书治经的关键，他在《文集》、与友人的书信中常常论及“训故明则古经明”¹，他常说：“经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其词也，所以成词者字也。由字以通其词，由词以通其道，必有渐”²。这样，戴震在治经明道的过程中，通过对经典文本进行校勘、辨伪、训释、疏注等考证工作，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整理古籍文献的方法，有自己的独到见解。

首先，戴震认为义理是读书治学的终极目标，他始终强调文字音韵对于义理的重要性，而音韵训诂则是寻求义理的工具：

夫所谓理义，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，将人人凿空得之，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？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，然后求之古经。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，今古悬隔也，然后求之训故。训故明则古经明，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，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。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，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。松崖先生之为经也，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故，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，由是推求理义，确有据依。彼歧训诂、理义二之，是训故非以明理义，而训诂胡为？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，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，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³。

在戴震看来，义理存在于典章制度；贤人圣人之理义存乎典章制度。也就是说，义理依附于典章制度等文

¹ 戴震《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，页505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² 戴震《与某书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，页495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³ 《戴氏杂录》《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，页505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献而存在，研究文献是为探究典章制度所蕴涵的义理，即孔孟之道。文献是传承贤人圣人载体的载体，阐述圣人贤人理义，不能弃典章制度于不顾而妄言经义；否则，势必会导致圣人理义流入异学曲说而贻害后学。因此，戴震认为阐发圣人之道离不开训诂，文字不通则经义不明，经义不明则何以明道？训诂也不能脱离理义而独立存在，对经典文本进行训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领悟圣人之道，明察孔孟大义。或者说，训诂是为理义而存在；如若不然，仅仅是为了训诂而训诂，训诂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。由训诂而通经以至于明道，即是戴震从事文献整理、治经明道的过程与方法。

这一过程，戴震是通过克服治经中的难题来实现的。他认为学问有三难：

余谓：“凡著述有三难：淹博难，识断难，精审难。二家淹博有之，识断、精审则未也。《三百篇》后，古音亦渐龙矣。屈宋辞赋，往往有齷齪之韵；汉虽近古，时有古音，而踳驳舛谬者亦不少；魏晋而后，古韵益微；降及唐宋，口习今音，而又间为古韵，此何足为典据？而二家惟事微引，殊少抉择，古韵亦茫无界畔，似诸韵皆可混通，此识断之难言也。古有韵之文，亦未易读，稍不精细，或韵在上而求诸下，韵在下而求诸上，韵在彼而误叶此；或本分而合之；或间句散文，而以为韵；或是韵而反不韵，甚则读破句，据误本，杂乡音。其误不在古人而在于我。二家亦往往不免，此精审之难言也。”¹ 读书治学不拘泥于专门，而博涉经史百家，读破万卷书，是为淹博；微引文献，不为古籍浩淼所左右，而有所抉择分别，做一番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工作，堪为识断；经籍距今远矣，音韵文意、句读章法等都会与后世差别很大，考古音，探古义，融会经文，以使误不在古人也不在我²，即为精审。识断是建立在淹博的基础上，而精审则是以淹博、识断为前提；由博返约，由繁而简以致精细；由识而断以致审慎，之所谓“综形名，任裁断”³，提出超文献的义理。淹博可为备材，识断则能选材，精审才可辨材。在稍后的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中戴震也提及这治学三难：

仆闻事于经学，盖有三难：淹博难，识断难，精审难。三者，仆诚不足于其间，其私自持，暨为书之大概，端在乎是⁴。

淹博易，而识断、精审则稍难。戴震洞察前人治经不足之处，如前贤各家郑渔仲、杨用修诸君子，多有博闻强识，淹博有之而识断、精审未也。他认为“君子于书，惧其不博也；既博矣，惧其不审也；既博且审矣，惧其不闻道也。七十子之徒，亲得圣人以为依归，能闻道者不多数焉。……”⁵“闻道”是戴震始终认为治学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。在达到这个境界之前，则需解决治经三难。

两汉经学伊始，儒生、经师们所关心的大多是对经文的文字音韵的训释，而对于文字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，多从孔子“春秋笔法”的角度阐释，尤其是一些自然现象，经师们常加以政治的傅会、诠释，很少从客观解释，以致忽视经文原意，牵强附会。避免这种情况，戴震认为首先要解决经之难明若干事：

至若经之难明，尚有若干事。诵《尧典》数行至“乃命羲和”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，则掩卷不能卒业。诵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自《关雎》而往，不知古音，徒强以协韵，则齷齪失读。诵古《礼经》，先《士冠礼》，不知古者宫室、衣服等制，则迷于其方，莫辨其用。不知古今地名沿革，则《禹贡》取方失其处所。不知少广、旁要，则《考工》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。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

¹ 《经考》卷三《古音叶韵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二册，页262，黄山书社，1994年9月。

² 戴震《古音叶韵》文中有“其误不在古人而在于我”一语，是说因精审未到而致，《戴震全书》第二册《经考》卷三，页262，黄山书社，1994年9月。

³ 《章太炎学术论著》，页118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6月。

⁴ 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，页371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⁵ 《东原文集》卷十一《序剑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，页389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名号，则比兴之意乖。而字学、故训、音声未始相离，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。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，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。释氏之徒，从而习其法，因窃为己有，谓来自西域，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。中土测天用句股，今西人易名三角、八线，其三角即句股，八线即缀术。然而三角之法穷，必以句股御之，用知句股者，法之尽备，名之至当也。……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，不追溯未失传之先，宜乎说之多凿也。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，儒者不宜忽置不讲。仆欲究其本始，为之又十年，渐于经有所会通，然后知圣人之道，如悬绳树槩，毫厘不可有差¹。

文中所言“若干事”，涉及古音文字、典制礼法、地理沿革、名物训诂、天文算术等，包括整理古籍的目录、版本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各方面。经籍文献自古流传至今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有碍经典理解的错误，需要对经典进行一番整理，做一些去伪存真的工作。具有广博的知识，一定的眼光，才能辨识经文正误，读懂经文；文义不通，则不知经文正误，无法体察圣人之意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戴震提出“淹博难、识断难、精审难”治经三难，可见其文献学功底之深厚。

其次，戴震认为善本作为古籍整理研究的底本当为最佳选择，然劣本的价值也不容忽视，并指出伪书的价值及如何使用。

古代藏书家对于古籍版本功底颇深，每得一书，多详细记载此书流传情况，考证古籍存佚，由此得窥一斑。戴震《方言注》根据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有关《方言》的记载，

……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，尝据宋槧驳正其误，然曾家宋槧，今亦不传，惟《永乐大典》所收，犹为完善。检其中“秦有漆娥之台”一条，与钱曾所举相符，知即从宋本录入。今取与近本相校，始知明人妄行改窜，颠倒错落，全失其初，不止钱曾所举之一处。……庶小学训诂之传，尚可以具见崖略，并以纠坊刻之谬，俾无迷误后来²。

知钱曾所藏为宋本，而今本《方言》经明人改窜，而不是前代原本。

一般来说，善本当为古籍整理的最佳选择。善本最初是指校勘精审的本子，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八言：“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，未有模印之法，人以藏书为贵，书不多有，而藏者精于雠对，故往往皆有善本”³；明清时期，前代如宋元版刻书籍日渐减少，宋元本子也日渐为一些藏书家所珍视，冠以“善本”之名；确切地说，此种善本是从其文物价值考虑的，从校勘的角度来说，宋元本不一定是善本，如宋代建阳坊刻本，校勘不精，有时所刻内容也不见得没有删节，恰似今日盗版印刷物，多有偷空减料之嫌。校勘中，一般选用的多是校勘性的善本，这样可以少走弯路，避免以讹承讹，贻误后学。然劣本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使用价值。戴震《再与卢侍讲书》一文，文中说：

今春又得一本，尚刻正文，前亦有韩元吉、郑元祐二序。虽非善本，有数处颇可据。《主言篇》“虽有国焉”，作“国馬”，不必借证于王肃所定之《家语》矣。《哀公问五义篇》“其心不置”，作“不置”，与《文王官人篇》“有施而不置”，《注》云“不形于心色也”，义可互订。此言不以己之尽忠信于人置诸心，而责人之忠信也。惟自励于躬行，不以己厚责人薄，是之谓“躬行忠信，其心不置。”因推寻下句“仁义在己而不害不知”，可取订于《制言》中所谓“有知之则愿也；莫之知，苟吾自知也”。此盖谓己有仁义之实，虽人不知，何害⁴。

¹ 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，页371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² 《方言注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补遗，页628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³ 转引黄永年师《古籍整理概论》，页13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年1月。

⁴ 《东原文集》卷三，《再与卢侍讲书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，页292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《孔子家语》是王肃为与郑玄争夺学术名分而私定，“故往往假托以为佐证”¹，戴震认为，王肃不仅私定《家语》，“并袭取之以为孔子之言，……合前后为答哀公问政，谬也”²。《孔子家语》是伪书，非善本书比伪书的价值大，是有可取之处的。当然，也并不是说伪书一无是处，如果换个角度来看，伪书也有很大价值的。伪书之“伪”，或年代之伪；或作者之伪；或内容之伪。年代之伪，是相较于伪书真正出现的年代与书中所言年代之差，如后世之书，时人为营利或迎合他人好古之习而伪托前代之书。作者之伪，或有无名之人，为使自己的观点、主张行于世而托名于当代或前代名宦贤达。内容之伪，多是做伪者出于各种目的，篡改、伪造古书，如王肃《孔子家语》。如果把伪书置于其出现的年代，以考察当时人、作伪者的心理状态、思想意识，则伪书不伪。在经学史上尤其是宋元以来，《古文尚书》的真伪问题，一直是经学家的关注焦点。戴震认为在东晋孔安国《传》未出之前，经师们所引《尚书》都是古本，即《古文尚书》；后世常说伪《古文尚书》，是王肃所撰，故意假托为佐证，宣称为两汉《古文尚书》，以之与郑玄相抗衡；东晋梅赜所奏上的《古文尚书》是后世《古文尚书》，而非汉代秘府所藏之《古文尚书》：

逸书既亡，东晋元帝时梅赜乃奏上《古文尚书》孔安国《传》，于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一之外，更析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为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，增多十九篇，析为二十五，以傅合五十八篇之数。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，而分同序者同卷，异序者异卷，亡篇之序，列次其间，为四十六卷，以傅合《艺文志》所录卷数，盖莫由知聚敛群书而为之者实始何人。赜自受之臧曹，曹受之梁柳，柳受之苏愉，愉受之郑冲，而其说往往与王肃不异，是又今之《古文尚书》，而非汉时秘府所藏、经师所涉之十六篇矣³。

如此，则伪书不伪。在治经过程中，对于一些“伪书”，戴震认为，把“伪书”置于出现的朝代，可反应出当时的学术发展，梅赜所献的《古文尚书》是东晋时的《古文尚书》，而非两汉时的《古文尚书》。戴震没有把梅赜所献《古文尚书》作为“伪书”，而是作为东晋时的《古文尚书》，如此，则伪书不伪，可以充分利用古籍文献研究历代学术。

第三，在治经过程中，戴震十分重视目录学对于文献整理的作用，并以之考证典籍的存佚、流传、真伪。

目录之学实乃读书入门必经之路，受到学者的重视，历代几乎都有官方或私家编订书籍目录，记载书籍流传、学术传承等情况，以总结前代与当代文化成果。传统的目录学源于西汉刘向、刘歆所作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，两书今已亡佚，可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得见一斑。中国古籍的分部在隋以前基本上是以七分法为主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沿《七略》之绪，分群书为《辑略》、《六艺略》、《诸子略》、《诗赋略》、《兵书略》、《术数略》、《方技略》。其后，间有六分法、四分法等，至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我国古籍目录分类的主导趋势四部分类法，即经、史、子、集正式形成并固定下来，相沿至今。

清代学者章学诚《校讎通义》称其有“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之功效⁴，目录学之成词是在清朝，初见于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一书⁵。据此可见，清代学者对目录学的重视，这一方面是学术本身发展必然趋势，另一方面也是乾嘉时期特色学术，即考据学存在的前提。目录为书之目，或一书之目；

¹ 《尚书义考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一册，页10，黄山书社，1994年7月。

² 《中庸补注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二册，页69—71，黄山书社，1994年9月。

³ 《东原文集》卷一《尚书今古文考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，页228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⁴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校注》下，页945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3月。

⁵ 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，页5，商务印书馆，1998年4月。

或群书之目。通常所言官修或私家目录，多属群书目录。然其编订的前提，都必须先有一定数量的书，才有编订书目的可能与必要。宋代以后，印刷术的发明，便利书籍的传播与流通；社会生活的丰富，也给文人学者的创作与著述提供良好的客观条件，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的数量大大超过历代，客观上需要对书籍流传、发展脉络做一番整理工作，典籍目录的研究因此提上日程。清代乾嘉学者继承清初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诸家朴实学风，力矫晚明束书不学之弊，转而精研古书文义、考证典籍源流，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。

治经当先考证经籍之存在与否，即所谓“辨章学术、考经源流”。戴震在《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》一文中说：

郑康成《六艺论》曰：“戴德传记八十五篇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曰：“《大戴礼记》十三卷，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。”今是书传本卷数与《隋志》合，而亡者四十六篇。《隋志》言“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，谓之《小戴记》”，殆因所亡篇数，傅合为是言欤？……凡大小戴两见者，文字多异。《隋志》已前，未有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者，则《隋志》不足据也。所亡篇目不存或两见，实多耳。然因《隋志》而知隋唐间所存已仅三十九篇¹。

戴震理清大、小戴《礼记》前代书目著录情况、篇数异同与存佚，知《隋志》以前没有提到小戴删节大戴之书的记录，有此断定《隋志》所言有傅会亡佚篇数之嫌，故而不足为据。《隋志》在证明小戴删节大戴之书这一问题上，是不可信的，然并不是说《隋志》这一记载毫无意义，据其可知《大戴礼记》在隋唐期间仅存三十九篇。书籍流传后世，由于天灾人祸、保存不善等因素，难免不发生文字脱误现象。书中的遗文阙句，戴震认为应求之各本参互校正，或有不可考订者，当存疑以俟后学有识者考之。

一些书传承脉络看似清晰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就需要从书的作者、内容及其面世之际考证。再如扬雄《方言》，戴震根据汉时相关典籍、目录是否著录《方言》一书，以考证此书在当时的流传²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列其所著书中，未见提及《方言》一字；《艺文志》中列有扬雄之作：如小学类有《训纂》一篇；儒家类有其序三十八篇，注云“《太玄》十九，《法言》十三，《乐》四。《箴》二。”杂赋有扬雄所作《赋》十二篇，唯独不见后世习言其所著《方言》。东汉一朝，亦无言及扬雄著《方言》者。只是到了汉末，

应劭《风俗通义序》始称：“周、秦常以岁八月遣轩辕之使求异代方言，还奏籍之，藏于秘室。及嬴氏之亡，遗弃脱漏，未见之者。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，林间翁孺才有梗概之法。扬雄好之，天下孝廉卫卒交会，周章质问，以次注续，二十七年尔，乃治正凡九千字。”又劭注《汉书》亦引扬雄《方言》一条，是称扬雄作《方言》实自劭始³。

魏晋以后，诸儒相沿，且众口一词，以《方言》为扬雄所著无疑。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据书中涉及避讳言辞而定是书之伪。戴震以为避讳之辞或有后人追改者，并非完全可信的，

……惟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，始考证《汉书》，断非雄作。然迈所摘刘歆与雄往返书中，既称在成帝时，不应孝成皇帝，又东汉明帝始讳庄，不应西汉之末即称庄遵为严君平，则未深中其要领。考书首“成帝时”云云，乃后人题下标注之文，传写舛讹，致与书连为一，实非歆之本词，文义尚厘然可辨。书中载扬、庄之名，不作“严”字，实未尝豫为明帝讳。其“严君平”字，或后人传写追改，亦

¹ 《东原文集》卷一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，页241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² 详见《校书提要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补遗，页626—628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³ 《方言注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补遗，页626，黄山书社，1995年10月。

未可知，皆不足断是书之伪¹。

避讳本是出于对先人、圣贤、尊者的敬畏、尊重，有很大的主观性、随意性，故此，戴震认为洪迈不能仅据此一点而定是书之伪。

之后，戴震根据两汉人的著述考证《方言》一书之真伪。许慎《说文解字叙》曰：

……《书》曰：“予欲观古人之象，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。”孔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，今亡矣夫。”盖非其不知而不问，人用己私，是非无正，巧说衰辞，使天下学者疑。盖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，故曰本立而道生，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。今叙篆文，合以古籀，博采通人，至于小大，信而有证，稽撰其说，将以理群类，解谬误，晓学者，达神旨，分别部居，不相杂厕也²。

文字为经艺之本，本之不立，道无以明，许慎撰《说文解字》的初衷，是有感于两汉今文学家文字不识而臆解经文、傅会五经圣贤之道的弊病，为“本立而道生”，许慎为了避免时人任意解字、随心解经、误读经书，博采先秦两汉古书、方言、文字资料，融会贯通而成《说文解字》。《说文解字》是当时人读书识字之书，是分析字形、解说文字、辨识声读的字典，因此，可以说书中极少主观性，也能够比较客观、真实地反应出两汉人的语言习惯，具有很强的可信性。有鉴于此，戴震《方言注》一文曰：

惟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多引雄说，而其文皆不见于《方言》。又慎所注字义，与今《方言》相同者不一而足，亦皆不标扬雄《方言》字，知当慎之时，此书尚不名《方言》，亦尚不以《方言》为雄作，故马、郑诸儒未尝称述。至东汉之末，应劭始有是说，魏孙炎注《尔雅》莫、貉、螳螂、蜂字，晋杜预注《左传》“授师子焉”句，始递相征引。沿及东晋郭璞，遂注其书，后儒皆称扬雄《方言》，盖由于是³。
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书中所引扬雄之言，均不见于《方言》；其所注字义，与今《方言》相同者很多，也均未提及扬雄著《方言》。

知当许慎之时，此书尚不名《方言》，也不以《方言》为扬雄所著，故马融、郑玄等人书中也都未曾提到扬雄著《方言》一事。后世述及扬雄著《方言》源于东汉末年应劭，至东晋郭璞注《方言》，已成定论。这是戴震根据《说文》中徵引《方言》的相关资料，以之说明扬雄与《方言》的关系。

戴震治经，涉猎经史百家，是当之无愧的文献学家。其在古籍文献整理、校勘上的观点与方法为其高足段玉裁所继承，并充分发挥，创立了我国校勘学理论，对于当前古籍整理研究，其功不可没。

¹ 《方言注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补遗，页 627，黄山书社，1995 年 10 月。

² 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卷十五上，页 763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 年 2 月。

³ 《方言注》，《戴震全书》第六册补遗，页 627，黄山书社，1995 年 10 月。